

红军长征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王 刚

摘 要: 红军长征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原因在于党和红军对长征前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束缚和理论与实际相脱节这两大理论困境进行了反思,并通过遵义会议的思想解放和实践探索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在实践层面,长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组织保证的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达。从深远影响看,长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原则,彰显了长征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支撑。

关键词: 红军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转折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6)06-0137-07

红军长征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极端困境中的战略转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前的学术界大多从宏观上肯定长征胜利以及阐述长征精神的意义,但对长征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本文试图回答:在失去根据地,又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严峻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反思并重构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长征具体在哪些维度上、以何种方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绝境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转折

红军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与一些错误思想,特别是与教条主义进行了激烈斗争。

(一) 长征前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理论困境

红军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面临两方面的理论困境。一方面是党内教条主义的束缚。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党内部分同志对当时中国国情认识不清,再加上共产国际的一些不当干预,党内接连出现了“左”倾盲动、“左”倾冒险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试图照搬照抄苏联革命经验,而忽视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1]152特点。“城市中心论”认为只要占领了大城市就能实现全国性的革命胜利,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都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发动的。然而,这种理论忽视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即中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反动势力在中心城市中占据绝对优势,从而导致大多数以夺取大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都失败

收稿日期:2026-04-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2&ZD002)。

作者简介: 王刚,男,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23)。

了,致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尤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使红军与优势敌人打阵地战。在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2]152},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初期,在军事指挥上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2]154},直接导致湘江战役等重大失利,中国革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血的教训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即使被苏联革命实践检验是真理的“城市中心论”,如果不符合中国实际,也不能照搬照抄。另一方面是理论与实际相脱节。长征前,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际仍然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3]310-311},只是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攻打大城市,而忽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这种理论与实际的脱节进一步加剧了党的理论困境,使党在应对城市武装暴动失利,特别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等问题上缺乏有效的针对性措施。

此外,共产国际的不当干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理论困境。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必须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共产国际又难以精准把握中国革命实际,这使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反复变化,“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论’、米夫的蛮横以及共产国际依据苏联国内政局的变化作出的朝令夕改的政令”^{[4]280}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内“左”倾错误,进而加深了党员干部的理论困境。长征前的理论困境不仅制约了革命的发展,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严峻挑战。

(二) 长征绝境中中国共产党对理论困境的反思

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理论困境,迫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不得不进行反思:为什么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共产国际指示进行的中国革命会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未来红军的出路在哪里?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什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体现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乃至遵义会议上的激烈争论中。党内争论焦点也由具体的军事指挥问题,逐渐上升到组织路线问题。其实,湘江战役后,“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

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5],于是党内“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3]386}。这种反思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遵义会议不仅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与组织上的错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脱离中国实际的军事指挥,“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2]156}。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作出的重大决策。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摆脱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革命经验的盲目依赖,转向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出发来探索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从而在思想上初步突破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对理论困境的突破。

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组织保证,而且使全党认识到:要推进中国革命,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探寻中国革命道路。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6]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更是开启了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征程。

(三) 长征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长征保存并锤炼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主体力量。长征途中,尽管红军遭受了重大人员伤亡和根据地损失,但党和红军主力却成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使中国革命的火种和一支理想信念坚定、经受千难万险考验的革命骨干队伍得以保留,并成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不仅在组织上保证了党的团结与统一,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共识。长征前,党内曾在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然而,在长征途中,面对严峻的斗争环境考验,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思,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全党逐渐形成了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日益获得广泛认同,并实现了党内思想的统一。这种在共同革命斗争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思想共识,不仅增强了党的团结,也为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特别是通过长征的实践检验,全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2]163},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一思想共识的形成,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同时也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了强大动力^[7]。

因此,红军长征中所面临的“绝境”不仅没有扼杀中国革命,反而以其巨大的倒逼力量,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反思和实践上的探索。这种反思和探索不是书斋里的逻辑推演,而是从失败教训的反思中得到的。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从党针对特殊困境的初步反思上升为全党必须遵循的思想共识。这既是对前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初步清算,又推进了此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实践推动:长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红军长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反思的宣示上,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探索实现的。这些实践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领导核心的新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保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需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坚强的组织保证。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在这一维度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领导地位。随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这进一步巩固了党中央的领导格局。

这一组织变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党的正确路线,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当然,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他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成功实践所积累的威望,源于他在长征途中一系列正确建议所展现的远

见卓识,源于他在遵义会议后军事指挥上的成功。就连“原来犯过‘左’倾错误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也支持毛泽东,而“张闻天和王稼祥作为有‘国际背景’的领导人,他们的支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4]283}。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其成员大多经历过长征考验,具有丰富的农村革命实践经验和深厚的本土情怀。这个领导集体的形成,为制定和执行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军事战略提供了最可靠的组织保证。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指挥中枢,能够克服包括张国焘分裂主义在内的各种风险挑战,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二)军事战略的新转变: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中国化

红军长征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阶段。马克思主义指出,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大军”^[8],强调“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做奴隶对待”^[9],主张“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10],并“始终把军队问题放在第一位”^[11]等。这些军事学说在长征的极端战争环境中实现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战略战术实现从阵地战向运动战的转变。长征前,“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中占据主导地位,红军机械套用苏联军事经验,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防御方针,主张实施“碉堡对碉堡”战略,与敌人拼消耗,这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如广昌战役的失利等。随着长征的行进,党和红军通过对军事挫折的深刻反思,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并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转而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军事战略战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领导人依据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以跳出敌人包围圈、完成战略转移为目标,确立了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并强调集中优势兵力,避实击虚,在机动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寻机杀敌。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临贵阳、逼近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等一系列作战行动,正是这一战略转变的具体体现。这不仅使红军在极端困难中保存了有生力量,摆脱了敌军围堵,也为长征最终胜利奠定了军事基础。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不仅是战术层面的调整,更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生动实践。另一方面,成立新“三人团”,实现军事领导体制与指挥权的转变。长征前期的军事指挥权由博古、李

德等人掌握,其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指挥方式导致红军屡受挫折。遵义会议后新“三人团”的建立,既克服了一两个人独断专行的弊端,也避免了紧要关头议而不决、贻误战机的问题,从而提高了重大问题的决策效率。这一组织调整使红军的战略战术更加贴合中国战场的实际需要,同时也使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如“避敌主力、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得到有效贯彻。这种军事指挥体制的转变,使红军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即遵义战役的胜利,这不仅提升了红军的作战效能与士气,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问题上开始摆脱对苏联军事经验的机械依赖,转向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军事道路。这一转变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关键的组织保证,其过程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阶段。因此,长征中军事战略与指挥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同中国革命具体战争实际相结合的重要体现。它不仅在实战中验证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也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思想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军事理论的中国化。

(三) 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思考: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中国化

红军长征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的新思考。其实,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以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即“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3]296}。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新思想还没有经过大规模战争环境的充分检验。长征途中,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持续围堵与极端复杂的作战环境,党和红军不得不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进行新的审视。通过长征前后胜利与失败两方面的对比,全党逐步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国革命必须立足于广大农村,依靠农民阶级,通过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正因为如此,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张国焘提出的南下主张时,毛泽东等人坚决反对,甚至冒着极大风险果断北上,寻求并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同时,红军长征也进一步验证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现实可行性。在转战途中,红军多次深入农

村地区,通过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方式,尝试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如川黔边、川西、川滇黔边、川陕甘等。尽管这些努力因敌我力量悬殊、地理环境恶劣、物资匮乏等因素,多数未能长期坚持,或未能完全实施,或中途被迫放弃,但它们仍在一定程度上为红军提供了短暂休整与补给的机会,并为后续革命斗争积累了初步的群众基础与经验。这些实践表明,在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不仅是避开国民党主力、保存实力的策略选择,更是发动农民、积蓄革命力量的有效途径。

创建新革命根据地的尝试,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中国社会条件下的适用性。红军在偏远农村地区立足,不仅避开了敌人统治的中心区域,还通过实施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与信仰等政策,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逐步壮大了革命力量。另一方面,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过程。党在革命根据地内推行的一系列战争、经济与民族政策,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又充分考虑了当地的实际状况与群众诉求,从而在具体政策层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这些探索不仅为红军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撑,也为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因此,长征促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实现了从理论设想到实践验证、从外来模式到自主探索的重要转变。

(四) 革命话语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达

红军长征不仅锻造了党和红军,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特殊环境中的民族化表达。

在政治话语方面,毛泽东等领导人用极具中国特色的语言总结和宣传长征。如关于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红军是英雄好汉”“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1]150}等论述,就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长征的政治意义,起到了革命宣传动员作用。此外,像“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豪迈诗句,像“北上抗日”“革命理想高于天”等宣传话语,像“彝海结盟”的民族团结佳话,像“半床棉被”的鱼水情深故事等都构成了生动感人的中国化革命叙事。这些精神和话语,易于被中国广大军民理解和接受,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感染力与号召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现

形式。

此外,长征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融合。如毛泽东等领导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相结合,强化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把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相贯通,深化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这种文化层面的调适与融合,不仅有助于争取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为其后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三、理论飞跃:长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红军长征不仅是党和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理论淬炼过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和红军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为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创立

红军长征胜利后,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著作,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三个层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以及长征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理论总结。

1935年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第一篇系统性报告。他在报告中概括了长征的历史意义,即“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1]149-150};指出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即“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1]150}。他更是把长征置于中国革命战略转变的宏观视野中,提出长征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1]142},这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把中国革命转向全民族抗战提供了理论与历史依据。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深刻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他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1]203}这就从理论上阐明了长征初期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他强调“人民

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1]207}。这既是对长征途中依靠群众、宣传革命主张的实践总结,也深刻揭示了革命战争必须依靠人民,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基本规律。该文系统批驳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特点以及积极防御、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战略战术原则,实现了对长征军事实践的方法论升华。

1937年7—8月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高度对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总结。《实践论》阐发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原理,体现了长征中依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战略的实践智慧;《矛盾论》系统论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揭示了长征过程中抓住主要矛盾、促成矛盾转化的辩证思维。这两部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它们将长征所展现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与独立自主,提升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从而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中,毛泽东也谈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正是基于对包括长征经验在内的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创造,经过延安整风,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改名《论党》)中就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强调它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2],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科学理论。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创立。而红军长征,作为这一飞跃过程中最艰难、最关键的实践,其经验无疑是毛泽东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成熟的催化剂。

(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原则的坚持

红军长征作为中国革命最为艰难曲折的实践,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的方法论原则,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历史主动精神等。

一是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得以确立。遵义会议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时,明确指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脱离中国战争实际,如不顾红军实际的“单纯防御路线”和“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3]387}等。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军事决策与

战略变化都强调要实事求是,要建立在对我力量对比、地理环境、社会民情等现实条件的周密分析之上。如放弃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就是基于敌情变化的务实抉择。四渡赤水战役更是把“知己知彼”的敌情分析与灵活机动的战术调整紧密结合,一切依据敌情变化而谋动,这就实现了由被动应战转向主动牵制敌人,从而体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15}的正确论断。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突破腊子口等战斗的胜利,也都是党中央立足实际取得的,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确立。

二是独立自主原则得到贯彻。红军长征前,在决定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往往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其代表的意见,缺乏自主性。中央红军长征后,由于电台损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一度中断。这一客观条件使党中央必须独立判断形势,自主作出决策。长征途中,无论是放弃入湘计划而转兵贵州,还是在与张国焘就“北上”“南下”战略发生分歧时的决断,乃至最终确定陕北为长征最后落脚点等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依据当时实际情况独立作出的。特别是遵义会议,我们党开始改变党的领导人的任命、调整、罢免均由共产国际决定的惯例,转而独立自主地任命自己的领导人。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本前提。

三是群众路线在极端环境中的推行。红军长征途经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与贫困边远地区。在长征途中,红军严格执行各种纪律,尊重民族风俗与宗教信仰,关心群众疾苦,从而赢得了沿途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这对红军来说不仅是生存与战略转移的现实需要,更是党的性质与宗旨的具体体现。长征使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与少数民族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夯实了群众基础。同时,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如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等也在长征中得到检验与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我们党始终植根于人民”,“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13]6}。

四是历史主动精神得到充分展现。长征途中,面对“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1]150}的极端困境,红军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与主动精神,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的壮举。

这表明,面对复杂严峻的革命斗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被动等待条件成熟,而是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在尊重实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这种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历史主动精神,激励着党在后续革命与建设中不断攻坚克难。

长征中党所提倡并强化的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原则,不仅指引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深刻融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4],这正是对长征所积淀的宝贵历史经验的继承与发展。

(三) 强化长征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支撑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13]3-6},这四个“伟大远征”概括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及影响。同时,红军长征还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包括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不怕艰难险阻、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紧密团结、顾全大局、依靠人民群众、艰苦奋斗^{[13]8-9}等。这种精神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在每日行军打仗、缺衣少食、牺牲不断的极端环境中淬炼而成的。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完美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精神支撑与内在动力。长征精神所蕴含的坚定信仰、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紧密团结等特质,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绝境中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期间,党和人民军队继承并弘扬长征精神,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面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新任务,长征精神继续发挥其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过程中,始终强调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步经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长征

精神中勇于开拓、攻坚克难的特质,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长征精神以其跨越时空的精神感召力和实践指引力,持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入精神动力,支撑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滋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

结 语

红军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面临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束缚和理论与实际相脱节这两大理论困境,而共产国际的不当干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种理论困境。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党和红军陷入绝境。在绝境中,党和红军对两大理论困境进行了反思,不仅解决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理论与实际相脱节问题,也保存并锤炼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主体力量,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共识。红军长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历史的清醒与时代的担当,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
-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4]顾海良,丁俊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1卷:1919—1949[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34年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279.
- [6]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39.
- [7]唐业仁.论长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J].黑河学刊,2016(1):34-36.
-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9.
- [9]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3.
- [10]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0.
- [11]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7.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90.
- [13]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to Advancing the Adapta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Wang Gang

Abstract: As a landmark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greatly advanc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Long March marked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in this adaptation, primarily because the Party and the Red Army profoundly reflected on two major theoretical predicaments prevailing before the Long March: the shackles of dogmatism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 historic shift was achieved through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itiated at the Zunyi Meeting. Practically speaking, the Long March facilit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s for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localized Marxist-Leninist military theories, Sinicized Marxist theories on revolutionary paths, and formed localized discourse expressions for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a. In terms of long-term influence, the Long March boosted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representing the first historic leap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established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for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a, and provided solid ideological support through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

Key words: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责任编辑:王 轲